

人大诗报

第 13 期

出版日期
20012年 4月 21日

REN DA SHI BAO

■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媒体总社
■ 主办:中文新世纪报社

■ 指导老师:黄彦菲老师
■ 社长:郑易林 陈煜 毛一丞

《人大诗报》



■ 投稿邮箱: zwxsj2007@163.com
■ 主编:涂好运 朱敏 虞丹韵

“诗歌在校园” ——王家新教授专访

■ 徐毅发 袁满芳

记者:王老师您好,可以就诗歌在大学校园里的现状谈谈您的看法吗?

王家新老师:我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来谈吧。人大文学院一直有学生写诗,我们老师也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我很高兴看到同学写诗,如果他们写的诗有前景,我也会尽力去关注和支持。而在其他专业中,也有不少同学爱好诗歌,之中也有同学把他们的创作给我看。不只是本科生,研究生中也有喜爱诗歌的。比如我所认识的哲学学院的一个研究生,诗写得不错,还一直与我保持联系。

有的同学即使不能写,也进行诗歌翻译,或者积极参加诗歌朗诵的活动。比如说“大学语文”课会定期组织诗歌朗诵活动。上一年年底我们隆重举行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专场朗诵会,这是在北京唯一一个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朗诵会,很有影响。瑞典的驻华文化参赞,还有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译者李笠都到场参加了,包括从外面请来的一些诗人。人大的同学十分踊跃,报名朗诵的就有四五十人,最后出于人数考虑我们只选了二十多位。为了对学生一视同仁,我没有进行挑选,是按照报名的先后次序选择的。朗诵会上他们有用中文朗诵的,也有用英文朗诵的,气氛都特别好。

这些都说明大家对诗歌很有积极性。即使是学法学、商学、新闻等专业的同学,他们对文学和诗歌还是非常有兴趣。我的课,以及这样一些活动,让他们把对诗歌的热情重新燃起。毕竟青春是诗歌的年龄啊,很多同学在中学时代对诗歌感兴趣,但后来往往为了考大学,就被套上了考试的枷锁了,诗歌的热情也被套住了。上大学之后,通过我们的讲学,这种暂时被压抑的诗歌热情再度焕发出来。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

当然诗歌在校园还面临着一个能否坚持的问题。校园里的诗歌还得坚持下去。我以前知道文学院有一位女生,大二的时候写的诗很不错,我也一直鼓励她写诗。但后来她因为考研究生比较忙,现在据我了解,她写诗比较少了。大学生进行诗歌创作,贵在坚持。诗歌不是一时的热情、兴趣,它是长期的。文学是一条长远的路,光有一时的热情还不够,文学这条路需要一生来走。如果能够走到底,可能就能成事。因此我希望大学生创作诗歌能坚持下去。

去。

记者:刚才您说到对学生的诗歌创作进行鼓励。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同学会认为,文学院现在的课程设置都是以批评和研究为主的,几乎没有针对创作的课程。那么您认为怎样可以给文学院、甚至其他专业的学生创造更大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空间呢?

王老师:说到课程的设置,其实在比以前好多了。文学院很多的老师,本身就是很好的学者、作家,比如阎连科、刘震云。文学院的院长孙郁教授,也是个学者型的作家,他对当代文学非常关注,是一位非常具有文人气质的作家。还有程光炜老师、姚丹老师等,他们都非常关注文学这一块。

课程设置其实也做了调整。比如说我开的课,给文学院本科生的课有创造性写作,给全校学生开的有大学语文和中外诗歌欣赏。学校十分重视大学语文这门课,并且前几年把大学语文改成了一门文学课。这学期有三百多个学生选修,说明这门课开得很不错的。这门课主要是我来讲,而且主要是讲诗歌。这门课主要是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文学素质、审美素质。学习文学史、文学理论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些课程中我更注重对同学素质的开发,对文学的敏感、创造、欣赏、批评、翻译等方面能力的培养。

另外还有我刚才讲到的一系列诗歌活动,包括建立驻校诗人制度,邀请著名诗人如多多、蓝蓝等进校园。通过讲课和活动,使同学们对诗歌的兴趣和感情得以焕发。我也尽己所能,对同学的创作、翻译,给予支持,建立一对一的交流。

当然在教学体制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有待我们去开发。比如我们一直想招收创造性写作的研究生,主要想培养创造性的文学人才。虽然一直有这样的想法,院里也比较支持,但现在还不能完全落实。这涉及到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以前还没有过这个“创造性写作”的研究生,因此,要真正落实还要做很多工作。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比如今年,有一位武汉大学的本科生,很想考人大的研究生,想跟着我从事诗歌的研究创作翻译。他的初选都通过了,但是复试时外语没考好,现在很可能就不能录取了。

我看过他的诗,写得很不错,甚至可以说是在全国的大学本科里面不错的,很有发展前景。但是因为这个问题,这样优秀的文学人才就不能被录取了。所以我们的课程,还有招生的体制,还需要改进。在文学创作、诗歌创作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去改变。

记者:您认为《人大诗报》作为一份以诗歌为主题的报纸,应在校园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请谈谈对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王老师:《人大诗报》我读过多期,在过去也写过稿子。这是院里多年支持的报刊,在我来人大之前就已经很支持了。其实有诗歌热情的,老师都会支持。报纸坚持了这么多年,的确很不容易。当然也能办得更好。现在各个高校都有诗歌刊物,像北大、复旦、武大等,都有以诗歌为主的文学社团、杂志,因为大学生从事文学创作主要是以诗歌的形式。我觉得我们应该多点借鉴其他院校的经验。我们的报纸可以做得更有活力、更敏感、更新鲜、更锐气一些。

记者:这个“锐气”我们应该怎样具体地理解?

王老师:这个也很难具体说清楚,比方说写诗不一定要那么四平八稳,有时候不一定要把诗写得“像诗”。其实诗歌对于年轻人来说,更重要的意义是一种方式。通过诗歌这种方式,你去成为自己,获得自己。要去“成为”,要去创造,要有勇气和锐气。做到这些,需要做很多工作。不仅是在诗稿方面,还有版面编辑、与作者的联系等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总之是尽量改变一点面貌吧,年轻人嘛要勇于探索!

七年间,我们的诗

刘寒青

翻开陈旧的《人大诗报》,时间赫然回到 2005 年的初春,也许正是阳光大好的一日,图书馆前的两树海棠正嫣然绽放。风夹着花香吹到不远处的人文楼,穿过紧绷的新窗纱,屋子里一群年轻的诗人正筹划着第一期的《人大诗报》,期待着它的诞生。转眼间,今年《人大诗报》进入了他的第八个年头,图书馆外的海棠依旧,但那群曾经在春日的窗边热烈讨论的诗人们已经不知道去了何方。

但是他们与诗相伴的那些日子依旧留在别人的记忆中。曾经为《人大诗报》做过指导老师的张洁宇老师现在还能记得那时“中关村 59 号诗人群”那些诗人的名字,《人大诗报》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老师说:“我当时的一个印象就是,其实人大的诗人群水平很高,一点不比北大的差,北大有很好的诗歌的‘场’,人大可能在这方面差一点,也许是我不够了解,因为我不是诗人,所以他们很多活动我并不是很了解,但我知道他们交往很多、很活跃。当时对《人大诗报》也是这样一个期待,期待他们形成自己的阵势和特色。”

然而《人大诗报》走到今天,似乎已经找不到它出发的地方,找不到它诞生那日的春日融融,海棠欲绽的生机。他似乎像是孱弱孤独的少年,找不到能使他健康茁壮成长的力量,找不到能在路上与他同行的伙伴。他也想发出自己的呼喊,可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他的声音太微弱太渺小,人们听不到。我们惶恐和不安,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处于这种境地。我们想让更多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我们想让更多的人读懂他。

然而诗歌注定是寂寞的,也许只会越来越寂寞。诗以言志,诗人不是时代的传声筒,他们要表达自己的声音,不过与唐诗那种在相对统一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歌不同,在现在这样五方杂处的社会,现代人的思想和情绪、经验、体验,会比古人更复杂,诗歌变得疏离与零散,远非“老妪能解”。所以新诗会给读者带来阅读过程上的阻隔,使读者很难能进入到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与想法中。然而张老师告诉我:“诗歌应该是人对人的一种‘召唤’,是诗人对读者的召唤,人人都懂的诗歌未必就是好诗。”

后来我回到老师,诗歌在人们的生活中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时,老师这样回答道:“诗歌可以是‘生活’之外的东西,没有诗歌,生活可以继续,但是,有没有诗歌的存在,‘生活’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诗歌是生活之外的东西,但又比生活本身更重要。”

七年间,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包括我们年纪和生活,不变的是我们的诗,它还像暖风下,初春树梢的第一枝海棠那样新鲜。《人大诗报》的路还要继续,它走在“生活”之外,却从未曾离弃生活。但即使是站在小径分叉的路口,可以选择未来的方向,它也许永远也不会走上那条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路。

成长下的印痕

■ 刘梦婵



时光的流逝总是不经意的,而让我们回想起它的存在性的便是这一路上留下的脚印。《人大诗报》匆匆地走过七载年华,那一份报纸是人大校园里诗歌的土壤,诗歌在一次次辛勤的园丁的呵护下成长,成长的不仅仅是数字越来越大的期号,还有那为诗歌坚守阵地的一代代学子。

在《人大诗报》第一期中,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曾写了对诗报创刊的《一点感想》,其中曾写道:“一所大学的诗歌创作要想在国内真正产生影响,处在靠前的位置,不能将自己孤立起来,闭门办报;而应该与当代最好的那些诗人经常建立联系,对当前诗歌创作的状态,也应该比较了解。”正是带着老师殷切的期望,文学院在为诗歌的这片园地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从几个校园诗人的“小圈子”扩展到全校范围,从人大一所学校传及多所院校,从诗歌分享深入到对诗歌探讨……《人大诗报》走出成长中的一个印痕,带着一份执着,传承着一份信念。

在快餐文化盛行的社会中,拥有一份文学的宁静显得弥足珍贵,而与主潮流的熙熙攘攘相悖,也注定着要坚守这寂寞与他人的不解。文学,远不如金钱那样诱惑也不如多媒体那样新鲜,它只是一剂治愈心灵苦痛的中药,即使你选择了去尝试,也不会马上见成效。诗歌,在文学中,则是会最快地抵达心灵深处的,但它往往给你带来的是不是两颊上的笑靥而是眼角噙着的泪抑或眉间蹙着的纹。此时的你或许总是拿着没有文学天赋的托词来远离这片寂寞之地,但在享受过周遭的欢娱后内心是否依旧是空空的呢?

《人大诗报》或许无法让你找到最为新鲜的时讯最为惊艳的图片,但是它的存在是为了给予每个读过它的人片刻的沉思与遐想。此时的诗报虽未成为程光炜老师所期望的“成为国内最优秀的诗人的‘诗坛’”,但它在一步步地成长着。不曾断绝便就有希望,在喧嚣下,必然会需要这样一批人来坚守着寂寞为这个社会保留些许的精神食粮。

回望那些曾为了这份报纸而付出过自己的力量的人们,曾挥洒过的青春依旧印在一份份报纸上,将时光的流逝记录下来,化为一个个静止在时空中的点,供后人回味也给予后人信心,时光此时停留在了这一点,结一个结来回想七载年华来畅想未来岁月。

《人大诗报》,祝你生日快乐。

2012年 4月 5日写

责任编辑:刘梦婵

编辑:梁文婷 张鹏瀚

美工:屠琳盈

对话杨庆祥

——诗歌报纸的

探讨

■ 袁满芳 徐毅发



4

记者:除了报纸本身的形成之外,我想了解一下报纸的接受视野,请问当年的读者群体是怎样的?其实我们现在只有少数人是主动来阅读诗歌,一般我们把报纸送到宿舍或是邮箱,也有很多是被埋没了。即便我们是面向全校的诗歌报刊,但是在受众的接受过程中路途还是比较坎坷的。

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做过调查,我记得有很多学生博客上读到人大诗报了,这期上有哪几首不错,确实是有反馈过来的信息。其实这个并不重要。你印那个小册子,你印五百份,其实都没必要,印两百册就够了,现在一般的诗集都是全国印五六百册,你还想你的这个有多大的受众,是不可能的事情。诗歌现在就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一般诗集都卖不出去,基本上没人买,除了一些很经典的诗人,家长会买给小孩看,其他所谓诗人自身的写作,都是自己掏钱出一本书。现在很多出版社都是乱印的,出书都不要书号,那么你就得付这个印刷费,这个很便宜,出出来以后大概印个两三百本,都是送朋友,这是目前基本的生存状况。

5

记者:做一个诗人还是很需要坚持的,而作为一个创办诗歌报纸的诗人,更需要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

杨:我不存在一个诗人不诗人的,我的职业主要是教师。我从十一岁就写诗,到现在也写,这一直都是我的个人爱好,是我个人的热情,个人智商的表现,我从来没想到拿出来让人读,拿去发表,我觉得这是诗歌写作的真正好的状态。诗歌啊、文学啊都是关乎内心的东西,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正常的职业,然后再写诗。你看哪个诗人是以写诗为生,那都是有职业的。中国古代的诗人都是官员、地主,没有说我就要做个诗人,没有一个国家有人可以

卖诗为生,不像小说是个大众文学的东西,诗歌是有受众的,所以诗歌纯粹就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现在很多人搞得非常庸俗,奖项啊发表啊,好像觉得这样子才是写诗,其实是离诗歌越来越远了。这几天网上不是说有一个女诗人,85年的还是88年的,抄袭,她把安妮宝贝等一些人作品里的好句子粘出来,然后编成一首诗,获过很多大奖,成了一位著名的先锋诗人,这下子摸大了。**记者:**其实说起这些诗人,他们现在都是小团体聚集在一起,不会有一个公开的、比较广的诗人圈,他们都是一个小群集,现在都加“著名”两个字在诗人前面,但是他的作品范围很小。

杨:现在都是小圈子,都是一些诗歌爱好者,他们有的人做生意赚了很多钱,然后回过头来以他的资本来支持诗歌,做一些公益的活动,比如说办一个刊物,因为办刊物国家也不给拨款,全靠这些商人来资助,这些商人本来就是诗迷。像北大的一位姓黄的诗人,是北京最大的地产商之一,所以他每年给北大几百万来做诗歌研究。其实诗歌这几年是特别繁荣的,就是因为经济好了,有钱的人多了,就会有大量的钱往这方面投入。你看中国的诗歌艺术比较发达的几个朝代都是特别富裕的,比如宋朝,当时是全球首富;唐也是,因为诗歌必须有一个支撑点,有闲暇的时候你才可以写出好的诗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记者:那您认为,针对这些我们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怎样的途径去拓宽这样一个互动的圈子呢?除了您刚才讲的约稿之外,还有什么有效途径?

杨: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其他的,你可以去参加一些高校的诗歌活动,认识一些人,没有更好的途径了,只能是说你和一些人很熟。你们要在自己身边发现一些真正有诗歌热情的人,他写的诗很好,有那么几个人就好了。我们当时做的事情也就是两三个人,再加上几个喜欢写诗的,也就五六个人,就把一个报纸做出来,你要说是那种社团化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你们要准确定位,比如说《中文新世纪》,它就是一个学生的院报,它就是发学生的习作、学校的新闻,搞一些宣传之类的,而诗歌,完全是一个非常纯洁的、纯文学的理念,不应该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在。而《中文月刊》就是个纯学术的,你们现在搞的乱七八糟的,我不知道你们学生媒体怎么弄的,学刊里面发一些什么作品。学刊我以前也编过,当时我在读博士,我觉得都是定位不明确,学刊应该完全是学术的东西,一定要发那种质量比较好的论文。诗歌本身,最多发两类,一个是纯诗歌,一个是散文诗,还有就是发一些诗歌评论。既然有了《人大诗报》,《中文新世纪》就不要发诗歌,可以少发,要发一些块头比较大的东西。

记者:在您的言辞中,我感觉,对于诗报的热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情感维系。正是因为《人大诗报》是你们这群诗歌爱好者自己办的,所以非常有感情,愿意把它做到精致,做到有价值。您认为有这样的因素吗?

杨:对。你要发自内心的热情去做这个事,不是说这是一个社团,我创了一个社团,我大学参加社团了,我做了一些事,老师也知道我参加社团了,这是没有用的。我们当时就是发自内心的热情要做这样一个杂志,团结和激励我们同龄人的写作。当然如果把它放在社团里面,也可以,但是你做的时候要以另外的一个视野来做。

记者:那你们当时除了办这个报纸,还有别的诗歌类的活动吗?比如说一起读诗、朗诵或者是说讨论,或者是和《人大诗报》相关的一些诗歌活动。

杨:讨论肯定是经常啊。每办一期刊物,就关于选稿,我们都是要在一起聊天的,包括这期重点推荐谁的作品啊,都要一起讨论的。朗诵诗歌活动一般都是在诗歌节的时候。

记者:现在报刊上的诗歌的水准不是特别高,这是一个让我们忧虑的问题。您怎么看?

杨:关键问题是你们怎么把它的局面打开。去年人大诗社的社长张弛就跟我讲,人大诗社现在一百多号人,可是现在也没感觉他们做什么活动是吧?其实每年招新的时候,招一百多号人有什么意义呢?大家都没有真正的交流,没有真正的提高。像人民大学这么大的学校,肯定有真正热爱写诗的人,然后在一起做一些事,我们不讲做什么诗歌节,这都是一些噱头,因为做那么大没必要。但是你们有一个小圈子,你们交流一下自己写的诗,然后探讨一些问题,这个非常重要的。

记者: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了对于报纸真正重新思考的时候。

杨:对啊,没有思考不成规划。第一,我觉得你们要做最好是把报纸改成刊物,最好是一个学期出一本,不要太厚,做的漂亮一点,也不会要太多钱,现在院里这方面的钱还是比较多的,关键是要有热情去做。

第二,是稿件的质量。做这种事情有时候是需要独断的,必须按照那么两三个人的审美标准,但前提是这个标准要靠得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标准,自己对诗歌都不了解,你就没办法选出好的稿件,如果你自己有很高的标准,你就可以自己去约稿,找人要稿件,不需要学校里投的那些稿件。也可以做专题,头条诗人谁谁谁,发他二十首,其实很简单,一个星期就能搞定。

1

记者:《人大诗报》是从“中关村59号诗人群”的手中创办起来的,您是“中关村59号诗人群”的重要成员,那么作为它的创办者之一,您创办报纸的初衷是怎样的呢?

杨:说来也是不久之前,已经过了些年头了,05年创办的。我们好像就办了四期。当时是04年的时候,那时候人大有个独立的诗歌节,每年大概十月份办。每年办诗歌节时都请很多学者,好多学生参加,都是在逸夫办,还搞一系列的讲座。诗歌节不是以文学院的名义办,那会儿和文学院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以人民大学的名义办,规模很大。刚开始几年都是何不言在办,他们都是人大本科生,后来是一个社会系的同学办的后来的几届。04年的时候,我是研究生,我就跟彭敏和何不言讲,你们光搞这个诗歌节,搞完也就没了,我想找一个载体把它记录下来,把写诗的人团结起来,其实人大的这个平台很好,所以我提议他们可以规划一下怎么做。结果,过了半年或者是几个月,就有一份报纸摆在我的桌子上了,我当时很惊讶他们的办事效率。我基本上不做事,就是进行一些规划,办事的基本上是何不言,还有几个美剧,都是我的好朋友,非常圈子化的东西,那时候都是我们在院里的学生活动室用电脑自己排版,排好了就送到印刷厂,印刷厂开个车把这个报纸运过来。每次一千份,向国内外要寄两百多份,其他的六七百份向北大、人大校内发一部分。有一些国内的诗人在海外,他们也会要,国内寄的特别多。因为我们当时办刊的宗旨就是立足北京,面向全国。

记者:那当时的状况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杨:当时的状况非常好。我们有太多稿件,基本上没有人大本校学生的稿件,因为一个学校,它写诗的水平不会太高,所以你们现在如果要把它办好,稿源还是应该面向全国。而且我们当时办报的方式,第一版往往会有一个重点推荐,推荐两个诗人,是我们挑选的当时年轻的、有实力的诗人,写简单的推荐理由。至于其他几版,有一版是学校里的一些诗人的作品,最多一版,另外一版是诗歌评论什么的,还有一版是那些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但是诗歌界又关注比较少的诗人,这些诗人不限于年轻诗人。我记得有一回是做的一位姓周的诗人,当时诗歌界的关注不够,这几年就影响越来越大了,我们做了他整个一版,关于他的评论、他的简介还有他的诗歌。

3

2

记者:其实你们当时的系统还是很完整的。还有诗歌评论、对当时的社会上的一些诗歌的反思,都是以诗人身份进行的文学或文字活动。但是再看我们现在的诗报,您觉得不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杨:我觉得你们现在把它做成了一个学生刊物,自从我们不做,你们接下来了之后,我们当时不是把它做成学生刊物的,而是当作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后来我对《人大诗报》这个名字不满意,想改名叫《人大诗刊》,不要做成报纸,我们当时之所以做成报纸是因为做报纸比较便宜。如果要办,最好的方法是做成杂志,像《中文月刊》那样,比如一期做五十页的样子,你们现在如果资金足够的话,也可以换形式。我好几年前就跟几个学生说,要他们做成诗刊,不要做成报纸。

记者:可是我觉得对诗歌文学来说,鉴赏也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是现在诗歌评论鉴赏有些少,报纸上比较多的诗歌。对于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您作何评价?

杨:你们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化程度太低了,你们和整个诗歌界没有互动,完全就是躲在家里看看书,又不认识外面写诗的人,又不参加活动,那就没办法把这个报纸办好,这个报纸永远是放在学校里的习作,其实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办法提升大家的水平。

记者:其实,就我感觉,《人大诗报》的稿件来源还是挺多的,但是这实际上对于审稿有很大的考验,不知道你们当年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杨:稿件来源是哪些地方很重要,要是都是学生的稿件就不行,我们当时是大量的社会稿件,我们主要就是发社会稿件,你必须和全国的诗歌界有一个互动,你最起码要和其他高校写的好的人有联系,北大的复旦的,那里有大量写诗的人,你要和他们联系。另外还有一些社会上的,这个其实还是你自己去找,现在其实比我们当时方便多了,我们当时就最多一个论坛,你现在随便在博客里面搜,诗人太多了,你在博客上看他的诗挺好,给他发个信说我要用你的诗,人家很高兴,也不会要你稿费。

记者:对,现在很多人在网络渠道中投稿,要求仅仅就是要你寄一份报纸给他。

杨:对,同时他会很高兴,他会把你的报纸拍成照片放在博客上,这样对你的报纸也是一种宣传。因为你是人大,人家还是很在意这样一个平台的。当时我们创刊的时候,很多论坛都发消息,他们就主动发消息说《人大诗报》创刊。

对 | 话

说明: A=人大诗报 B=人大诗社 (B1=陈怡菁 B2=张弛)

关于创作

A: 二位为什么会萌生写诗的想法?

B1: 对我来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受身边一些朋友的影响,主要是复旦诗社的一些成员。我觉得写诗既能表达私人情绪,又可以起到自我宣泄的作用。诗歌既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但它同时又把自己呈现给别人看,不过它有两个开关,一个开关是给大众看的,另一个开关是针对自己内心的。这恰恰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神奇之处,小说、散文等都无法同时满足二者。另一方面原因是我在高三时阅读了一些诗,并在诗歌中找到了能与之发生共鸣的思想。起初,我读海子、北岛,然后发现,诗歌是一个神奇的东西,而写诗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我走上了诗歌写作的道路。

B2: 可能很多过来人都会说,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会有写诗的冲动,等到我们年纪一岁一岁大上去之后,我们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世俗,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也会变得越来越符合成人的标准。我很庆幸我们还身处在校园这样一个环境中,每天都有很多以我们的视角观察来看很新鲜的事情在发生,而这些事情往往带给我们很多触动。因为我们终究要慢慢从象牙塔走向社会,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属于青春的文体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写诗。特别是那些平时不善言辞的人,就可以通过写诗这一媒介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B1: 而且有人说,大学不能离开三件事,那就是诗歌、摇滚音乐以及恋爱。

B2: 其实,写诗也能带给你恋爱的感觉,不过那是一种与自己恋爱的感觉。有些作家会自己开几个QQ号,然后视频时一人分饰多角,自己和自己交谈。我不否认这是一种可以更好认识自己的方式。再者,写作中常常会使用多线程结构,小说可以这样,诗歌也行。

我在
中关村大街
59号

你呢?

■ 陈怡菁 (人大诗社)

人大诗社

■ 学生记者: 朱敏 许运涛

A: 那二位是何时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

B1: 我写诗的历史不长,是从去年也就是大学之后开始的。

B2: 严格意义上说,我是从今年开始的。不过我小时写过古诗,后来也有将自己的情感片段记录下来的经历。

A: 那影响你们创作的诗人是谁呢?

B1: 我觉得一开始让我有写诗欲望的是张枣,在阅读的过程中最影响我的是海子。

A: 读他的诗歌有什么特别有感觉吗?

B1: 感同身受吧,而且我觉得他的诗里面意象的情怀比较浓,之后我都回想起他的句子。

B2: 我觉得他的作品底子里比较受辛弃疾的影响,可能语言形式不一样,但感觉相似,我读辛弃疾的作品比较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你在写的时候没有刻意地去学他,但在气质上是贯通的,中国人比较讲究气质。其实中国的诗都很讲究意境,没有意境就不可能被推崇得那么高。外国的诗也有自己的特点,你不能把它套进去,在他的民族中自有他的味道存在。

关于意象

A: 刚刚两位提到古诗诗,那么虽然在现代社会已然难以找到“河桥酒幔青”的古典意境,但仍然有很多人乐此不疲地在进行着古诗的创作,例如“阑干拍遍”、“独上高楼”等在眼下几乎难以达成,但却依旧出现在现代人的诗文创中。请问二位是如何审视这种现实与诗歌脱节的现象的?

B1: 我觉得这就类似于辛弃疾的诗句“为赋新词强说愁”。诗歌意象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毕竟意象会随着时代改变,但是诗歌的精神内核是始终不会变的。

B2: 我觉得现代人写的古诗总感觉有些别扭,明明可以用白话讲出来的东西非得用古文表达就显得十分生硬。不过古文的确很强大,复杂的感情往往能以精练的文字表达出来。现代人写古诗有故作、故意之嫌。但我们也理应看到,现代许多作家,尤其是诗人还深受古诗影响。毕竟大家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很多时候在不经意间就把某个古典意象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了。

A: 既然两位都有诗歌创作的经验,那在你们的诗中会被反复提及的意象或情绪是什么呢?

B1: 应该是孤独吧。

A: 请解释一下这个“孤独”。

B1: 不少诗人都认为寂寞感很重要。这种寂寞既可以是全人类的寂寞,也可以是某一个体某一时刻的寂寞。

B2: 我想再阐发一下,没有一个人的经历会和另一个人重复,所以说每一个人心里有一些东西总是只有他(她)一个人知道。当他(她)再次回顾,睹物思情,寂寞就产生了。因为这个时候,再没有人能读懂那一刻的那种心情。

人大诗报本身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在我了解到“中关村59号诗人群”之前。很难说现在对于诗歌来说是一个好的时代,这个伪善多于真诚的时代。当我们一遍遍回忆海子、北岛的朦胧诗时候,也许中关村诗人群才是更贴近真实的存在。由杨庆祥、何不言等五人组成的诗人群被戏称为一个秘密的诗歌地下组织。如今少年们变成老男孩,而今晚我再一次读到彭敏的《入秋》,依然难掩心中悸动。教二草坪就快绿了,而中关村59号的诗人们却早已像秋叶洒落四方。当我读这首《入秋》时,想的更多的是春天,是九十九个我自己。

“现在秋天还没有来临”(彭敏《入秋》),秋日应该是一切像树一样的诗人的共同情结吧。“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里尔克《秋日》)秋天还没有来临,这是彭敏的《入秋》这首诗的真正语境,一个无限迫近于秋天的心焦的日子。

“我”在这样的日子,沉默不语,心却仿

B1: 没有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且,当一个读者在阅读一首诗的时候,他(她)感受到的孤独寂寞,和作者自身的孤独又可能全然不同。

A: 那么你认为读者能真正理解到作者的孤独吗?

B1: 我觉得不需要理解,感受就好了。不过世界上做不到完全的感同身受。

B2: 当代接受理论有这样一种观点:“任何对诗歌意义的挖掘都是一种曲解”。正如霍拉勃所说:“我们决不可能像传统批评相信的那样去复述一首诗或‘接近’于它的本意,我们最多只能构成另一首诗,甚至这种系统的再阐述也总是一种对原诗的曲解。”

A: 所以说读者的阅读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B1: 对,读者其实是可以带着自己的经历去阅读诗歌的,每一首诗都有多种解读可能,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一首诗中找到自己。

A: 诗歌的意象有时很苦涩,只是作者本人情感的抒发,但诗人想和读者达到怎样的互动呢?

B1: 就好像是捉迷藏一样,既希望被找到,又希望不被发现。

A: 那你愿意将个人情感的表达分享给读者看吗?

B1: 我觉得或许可以分为两类吧,就是当你把诗歌当做一种事业的时候,你会去耐心打磨它,展现给读者看;另一个就是,比如说王以培老师,他喝醉酒写的那些东西,就是很自娱的东西,他不需要给其他人看,只是把它给要赠的人或者自己看。

关于纯诗

A: 眼下有一种提法叫“纯文学”、“纯诗”,请问二位对“纯诗”这一概念如何理解?

B1: 我有个朋友就是写纯诗的,她之前的诗歌常常写乡愁之类的,然后这些诗一出来也更容易受到赞同。后来她自己不断地尝试,发现写纯诗的难度比传统诗歌要高。写作中遇到困难,瓶颈是常有的事。而且她的此类创作没有受到之前那样的好评。不过她坦言自己很享受创作纯诗的过程。

A: 那你所理解的“纯诗”的定义是什么?

B1: 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不太容易看懂的诗歌作品。纯诗就像达利的画一样,很多你不会想到的东西被刻意罗列在一起,给人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感觉。

A: 有人认为,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依然要努力接近最活跃的、来自现实社会的口头语言,去吸纳例如流行音乐歌词等自由创作的营养,对此你们有何想法?

B1: 我觉得现在之所以会流行周杰伦的这类歌,把古诗词挪用到现代歌词里,还是因为社会风气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大家没有去创作一些好的东西,只是不断地从古诗里面取一些精华的东西出来。这可能和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阶段有很大关系,大家还在去靠快餐文化去拉动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我觉得只有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很多人才有可能真正开始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这个时候诗歌才会真正走进他的视野。

A: 那你觉得林夕、方文山等人的一些优美的歌词可以真正被称作诗么?

B1: 我觉得不可以。因为诗歌创作不可以带有功利性。一些伟大的诗人他们一生只写一点点诗,包括之前获诺贝尔奖的特朗斯特罗姆,他一生只出了一本诗集,就那么厚。像林夕一年就要写那么多流行歌词,但这跟诗不一样,诗歌是需要不断雕琢的东西,而且它不带有功利性。

B2: 对,诗歌既不能被批量化大生产,也不可以被认为是用来糊口的。多数的现代诗人都有自己的正业。

关于社团

A: 我们知道,北大一直延续着举办诗歌节的传统,哪怕社团暂时没有人去打理,但是他们的诗歌节是每年都会有的。但不少人认为北方诗歌不如南方活跃,你认为么? B1: 南方有复旦诗社,同济的莱茵诗社,还有周边一些学校的诗社群。而北方的话属北大一家独大。南方高校虽然每个学校力量都参差不齐,不如北大五四文学社这样牛气,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固定的联盟。南方诗歌之所以能够一直写下去,是因为一直有诗人涌现出来。例如复旦的肖水,同济的朱瑜,他们都是各自联盟的核心人物。每一个诗社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来督促大家,例如每个月举办匿名评诗会。毕竟人是有惰性的,而创作本身就是很即兴、自由的活动。

A: 如果有人说你一定要给我写,这样会不会造成该团体中的一些诗人只注重抒发自己的内心,但是没有真正起到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功效?

B1: 当一个诗人的创作还未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那他(她)就需要不断去打磨自己的写诗技巧,有人督促其写作可以起到促进作用。诗歌并不完全是一个情绪化的东西,它还有许多讲究在里面,比如说用词、表达方式,怎样达到最佳的美感等等。不过即兴创作又另当别论,王以培老师曾说,他喝醉酒的时候写的东西自我感觉很好,但是酒醒来之后却感慨自己写的是什么烂东西。

A: 有人认为,诗人就是喝醉酒后才有创作的热情,才能才会被相应激发出来。不少诗人也酗酒、抽烟,不修边幅,你觉得是生活使他用这样的方式把诗歌创作出来,还是为了写诗才这样的?

B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以《幽梦影》闻名的清代作家张潮有一句话:“人无癖不可交”,人没有自己的癖好的话就意味着没有深情,没有深情的人怎么能写出真诚的东西呢?何况诗歌是很需要情感充沛的一个产物。

A: 你们刚才提到一个好的社团需要一个核心人物,那么人大诗社呢?

B2: 人大诗社的确缺少一个核心人物,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做得不好,人大的气氛也不是很浓。之前是有过,但面临着问题,我们招的很多人都是大一的,他们进来的时候没有对诗歌强烈的爱好,可能更倾向于把他当成一个社团,如果真要把他弄好的话,就要进行整顿,就像延安整风运动一样,把几个精干的留下来,有组织地管理。

A: 你们也同意说诗歌是一种比较情绪化的东西,但如果设立一个诗社进行活动,要有一个核心的人物来组织,就要强制成员们写诗,如果有人规定我要完成多少东西,我会觉得没有感情去表达。

B2: 这是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一堆感情在那里只是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要把它进行雕刻,中间肯定会有困难,有时觉得不想去动它,就要一个人去指导,这两者没有矛盾。而且如果一个人真讨厌一样东西,没有人能强迫他做。写诗也会有惰性,就好像胡朗练钢琴一样,如果他爸爸不强迫他去练得话,他自己也会有惰性,虽然他很喜欢这种东西,如果没有人去盯,他很快就会被埋没掉了。

羽毛”(李有兰《秋》)。

秋天还没有来临,它在靠近,“云层匆匆奔赴他方”(彭敏《入秋》)。石头是一个关节,借此西西弗与一座大山连接并转动(面向和转向)。“西西弗再次把灵魂扛在肩上”(彭敏《入秋》)，“我”在幻想之后找回了在现实之后消融在“面向”中的主体性。然而,秋天真的来临了,面向秋天,“我”只能“双手抱头,快步走开。”

现实,现实之后,幻想,幻想之后,全诗

四节的时间序列应该是这样排列的。全诗出现了一个“我”,即是重新植根于幻想之后的已然消融的“我”。

是的,“一些事物转过身去,一些事物正向我们走来。”

诗歌之于我们

■ 逋光

诗歌是一种很古老的文体,在我看来,无论中外,无论古今,很多诗都有着共同的“通灵性”,通天地或者通人心。一些人通过写诗,抒发感情;一些人通过读诗,进行对话。诗有不同的气质,带给人们笑和泪,使人们燃烧抑或沉静。

在这里,我姑妄用“我们”来说话,并不是想以“我们”之名写我之想法,而是希望通过呈现身边人对诗歌的看法,来说说“诗歌之于我们”的一个故事。诗歌之于我,我不敢妄图理解和诠释诗歌的全部奥秘,但求倾听一种或新鲜或叛逆或温情的声音。但是诗歌之于生活在人大校园里的“我们”又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的诗和诗人

屈原、杜甫、白居易、张若虚、顾城、海子、席慕容、冰心、徐志摩、泰戈尔、叶芝、里尔克……我们对诗和诗人从来都是不陌生的,虽然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与诗歌有交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离诗很远,我们大都处在与诗歌亲密和疏远中间的一群人。对于喜欢的诗人或者诗歌,张琳蔚同学因为“意象叠加很丰富,敏锐的想象力”而偏向海子的“长诗和组诗”,而陈铭心同学则因为席慕容“文字细腻,感情却很丰富,会让人联想起自己的经历和回忆,所以会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感动”,找到了她的诗歌共鸣。她说:“情到深处是为诗。”诗歌对于我们来说,很多时候确实让我们找到了一种情感的依靠和精神的抚慰,那些不敢倾吐的,羞于说出口的一枚枚“纽扣”平时都只放在衣兜里珍藏,到了情最浓时拿出来对着一首诗静静抚摸,饮下窗口射进阳光下的灰尘,也许时光便不会舍得再将人的心灵紧紧接住了。

然而静静地想来,我们喜欢的诗人大多是写自我生活的现代诗人,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老师说起现代诗歌时的一句话:“现代诗歌起于都市化生活,没有完整的传统,是人自我认识的过程。”也许正是因为“自我认识”,很多人从共鸣角度上更喜欢现代诗歌,但另一方面,我们由于从小就有背诵古诗的“必修课”,自然还是有人会对古诗倍加青睐。文学院的施雅莉同学就说:“我

最喜欢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古今能超过这首诗的,我没找到,至少现在还没读到。”施同学从小就背诵了大量的古诗名篇,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因此,相对于“大众都可以接触,比较平民化,适合抒写瞬间灵感和小性情”的现代诗,古诗“是高雅而精英的艺术,它以意境取胜,工巧,但又不失风格自然的诗篇”。虽然这些话难免她个人对古诗喜爱的偏执,但却也表达了一部分深深喜爱古诗的同学们的观点,也体现了一些同学对现代诗的小误解——这可能要通过多接触和理解现代诗才会慢慢解除。

写诗和校园诗人

翻看最初的《人大诗报》,我总会有个感慨,原先是一群写诗的人在做诗报,现在却是我们这些不写诗的人在做。这到底是我们的错还是时代的错位——竟一时不得而知了。说起写诗,我们总觉得有些距离感,无论是讲究平仄押韵的古诗,还是更适合现代人表现的现代诗。但是一个拥有青春的躯体勃发出的激情和力量却又似乎决定了我们是更容易接近诗歌的一群人。北岛曾经在《新周刊》的采访时说“诗歌永远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青春并不是一种年龄,而是青春的激情”。他认为自己是具有这种青春的热情和激情的,而“现在的孩子的问题就是没有青春”。也许正如北岛看到的那样,我们这些孩子对比于他们来说,多是暮气沉沉,缺少对世界的好奇心,尤其是在网络时代让我们可以“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宅男”“宅女”。这种信息时代下衍生的“宅文化”在给我们带来信息传输方便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扼杀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在我们眼里,世界并不像它本身那么珍贵和美丽,我们常常带着一种习惯性的漠视来看原本的世界,因此更容易缺少激情。

然而同时,越是缺少这种土壤和养分,我们就越期待诗歌回到大家身边,时代和青春的激情也呼唤着诗歌在校园中重生。

虽然现在有些时候,写过几首的青年就敢自称“青年诗人”,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也算是一种希望。

在“大学里面是否需要学生诗人”的问题上,文学院王斯璇同学坚定地說道:“需要啊!这么激荡的年龄多需要诗人啊!大学里面的青年诗人是代表时代发声的力量。”而相对于这种呼唤式的回答,蔡琮同学则具体说明了学生诗人在校园中的必要性:“现实的社会里,有时候,作为青年的我们似乎过于实际,而少了一点纯粹的精神上的感悟与追求。诗歌的存在,或许可以让大学校园这个‘象牙塔’,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更多一份纯净。”而王一凡同学的回答则更加的掷地有声:“对于诗歌和诗人来讲,如今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不仅仅大学,整个浮躁的社会都丢失了对诗歌的兴趣和对诗人的尊敬。然而正因如此,在最黑暗的时期,往往可以喷薄出最绚烂的火焰。大学校园与社会不同,理想尚未破灭,人情尚不复杂,而且以往很多诗人也往往在二十多岁发表自己的处女作。因此我认为大学校园呼唤青年诗人的诞生,我们也应该将诗歌拾起,重新用深情的吟唱洗涤世界的污秽。”无论是哪种回答,都能看出我们阅读校园诗歌的渴望,也真心希望在大学这个相对于社会更加单纯的“圈”中,诞生我们自己的诗歌,希望有一群人用诗歌的方式抒发我们道不出、说不明的经历和感受。期待未完待续……

诗歌朗诵会

每年“五四”系列活动都有诗歌朗诵比赛,今年文学院承办的“我诗依旧”比赛即承袭了这一传统。朗诵比赛中的诗歌不乏原创和改编的诗歌,但是由于是五四的关系,主题大多是革命、爱国等红色题材,语言多采用排比手法,以形成大气磅礴的状

势,同时声情并茂的朗诵很容易使听者情绪高涨——从这个方面来看,“诗歌边缘化”似乎是个伪命题。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诗歌是否真的边缘化,也不论是否有人希望通过“边缘化”进行炒作,强调诗歌对大众的功能性,我只是想说,诗歌朗诵会并不能作为衡量诗歌是否“热”的尺度,而且,诗歌本身也不需要“热闹”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诗歌本身就是自我认知的文字,是一种“可以”小众的文化,它可以处在孤独的位置上自洽。

诗歌朗诵会作为一种诗歌文字的发声版,在我看来是一种诗歌交流方式。还记得11年去听文学院举办的特朗斯特朗姆诗歌朗诵会,即是一种典型的以诗歌交流为目的的朗诵会。由于诗歌里面经常涉及宗教话语,很多的诗歌都很深沉,不太适合用饱含情感的语气去朗读,而是一种冷静的,不加修饰的诉说,但恰恰是这种形式,让我们还原了诗歌本身,不会让诗歌成为个人感情的宣泄——我们期待真正可以作为交流诗歌的朗诵会更多地出现。

诗歌的魅力

诗歌为什么会吸引我们呢?这种问题应该是很难回答的。文学院虞丹瑜同学说:“诗歌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其模糊性,诗歌可以给创作者更多的创造、奇思妙想的空间和可能,从而带给读者许多不可思议却很有道理的启发。”相对于诗歌,散文是更容易出成绩的,因此写诗的舒婷、北岛、席慕容去写散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于诗歌与散文的并置,文学院杨颖同学说:“诗歌的魅力,我觉得像烟花一样,凝成一瞬的光痕与绽放,很惊艳,也很震撼。而散文像被

一个长者带着在茶余饭后去漫游。”这似乎道出了散文相对于诗歌来说更轻松舒适,也不会太多地顾忌韵律性,当然这并不排除好的散文在行文中常常会存在一种音乐美感。而王一凡同学和陈怡逸同学的话似乎更有启发性,王同学认为诗歌的魅力在于“突破常规语言构架方式的张力。诗歌语言精致典雅,不同于其它体裁。诗句押韵,带有音韵上的美感。诗言志,诗歌这种体裁最易表达出丰富的情感。”陈同学则说:“诗的魅力于我,当然是一种强大的生命感发力,不管是哲思的,或是抒情的,都给人一种深深的内在的震撼力,这种震撼力很浓缩,很精美,但是特别有力量。”

其实,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是不同的表达方式,适合于不同的场合和情感,我们无需将对立甚至割裂,非要说谁好谁坏,我们只是想说出诗歌对于我们存在的独特性,和他自身在扮演自己的角色的时候对我们的意义。还是引用北岛转回写诗歌的一句话吧,“诗歌像修行,要保持内心的封闭状态,才能和自己有深入对话。”他源于对自己的敌意重新写回诗歌,这是一个诗人青春激情的必然表达方式,而对于我们,读诗歌和读散文都是一种聆听,只是聆听的方式和程度不同。

文章最后,笔者希望这篇文章不是对诗歌的诋毁,也不是对诗歌的赞美。诗歌之于我们,还是很难说。

走向

诗歌世界的路

■ 月羊

如果不是进了中文专业,或许我就再不会尝试去叩响通向诗歌世界的大门了。

跟古典诗词的相遇要来得早一些。13岁的时候,跟三两好友谈诗,兴至则自己也胡诌几首,然后自我陶醉,又与他人互评;18岁的时候,与死党漫步山道之上,一人一句背着《长恨歌》,看山花摇曳。

所谓无知者无畏。上了大学,进了文学院,眼里见的是“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的押韵规范,耳里听的是“现代人就不要写古诗献丑”的教诲,自觉惭愧。除此又有自己散漫的个性渐不悉如此多的条条框框和整齐划一的句子,便将古典诗歌束之高阁了。

因着课业的关系,加之莫名产生的兴趣,读起了外国诗歌(我觉着看书和读书或者能划上等号,诗歌却只能用“读”而不能“看”。对着诗歌,心里是须得逐字逐词去体味诗人的斟酌的,扫视浏览是给不了你半丁点印象的),而且一读就是一个人的全

集。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于仅仅从网络或别人的作品中摘引的一首诗甚至是几句来窥探诗歌世界,还把那一点可怜的知识移植到自己的文章中或者挂在嘴上作为炫耀的资本,却让诗歌和诗人的情感世界面目全非。曾经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也会目光短浅地陶醉于别人引用的小句子,然后当翻开诗集时发现不是每一首诗都让我觉得美,便失望地把书弃之不顾。庆幸的,专业课上的作业多给了我一个机会去重新认识这片天空。一本全集打开,第一次阅读让我觉得如此困难和茫然。咬咬牙,一次,两次,三次,把所有诗歌来回回看了好几遍,又把诗人生平扫了好几遍,再翻翻各种研究资料,这样子一本诗集看了差不多一个学期。突然有一天,又一次打开那本书,眼前“喇”地一片敞

亮——心里的诗歌之眼被打开了。倒不是说自己明白了每一句诗,而是当我看着它,心里都有所体悟,捉摸或浓或淡的滋味。即使不能完全领会诗人的意思,也忍不住要从心里发出一句赞叹,真是天才!

大抵好的诗人只能是天生的,都是天才。还记得有一次和我的父亲空,一本全集打开,第一次阅读让我觉得如此困难和茫然。咬咬牙,一次,两次,三次,把所有诗歌来回回看了好几遍,又把诗人生平扫了好几遍,再翻翻各种研究资料,这样子一本诗集看了差不多一个学期。突然有一天,又一次打开那本书,眼前“喇”地一片敞

家可能终其一生也未受到赏识,但他们的作品却最终烙印在了历史的辉煌长卷上。其实很难去评价,现世受称赞的不好,眼下被讥讽的却可能千古流芳。我们既怕费了物力财力去支持一些废物,又怕把真美埋没,何去何从呢?回到诗歌上,当今诗歌可謂是最不受中国人注意的艺术形式了,我们要怪当前诗坛无佳作呢,还是要说当下少有审美的眼睛?

草草写就,不成章法。不过想起今年诗歌朗诵比赛标题,心有所感:我诗依旧,我心依然。